

地理科学的 理论与实践

D I L I
K E X U E D E
L I L U N Y U
S H I J I A N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曾菊新 邓宏兵 龚胜生 喻光明 主编





D I L I
K E X U E D E
L I L U N Y U
S H I J I A N

地理科学的 理论与实践

曾菊新 邓宏兵 龚胜生 喻光明 主编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地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 曾菊新等主编.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5
ISBN 7-5352-2624-8

I. 地… II. 曾… III. 地理学—文集
IV. K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4676 号

地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 曾菊新 邓宏兵 主编
龚胜生 喻光明

责任编辑: 汪 敏

封面设计: 王 梅

出版发行: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武昌黄鹄路 75 号

电话: 86782508
邮编: 430077

印 刷: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督 印: 刘春尧

邮编: 430035

889mm × 1194mm 16 开 21 印张 1 插页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62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000

ISBN 7-5352-2624-8 / N · 44

定价: 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找承印厂更换

前 言

1958年6月成立的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现为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地理教育与科学研究基地之一,为我国输送了3000多名本专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近10多年来,学院办学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学科建设成绩显著,已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计算机绘图室、土壤实验室、地质标本室、气象站、多媒体教室、语音室等现代化的实验和教学设施。学院的学科专业文理兼备、理学和管理学兼有,本专科教育发展迅速,基本形成以本科教学为依托,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为标志的多层次办学格局。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现已培养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经济、课程与教学论等专业硕士生以及地学史与历史地理方向 and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发展战略方向的博士生共200多名。学科研究方向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系以来共承担各级科研项目300多项。为了全方位反映地理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成果,促进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学院决定从教职工近10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筛选53篇编成论文集。本文集涉及区域经济、流域开发、城市发展、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持续发展、遥感应用、历史地理、旅游开发和地理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文集由曾菊新、邓宏兵、龚胜生和喻光明担任主编,王芳、周杰文、李俊杰等同志也协助做了大量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编委会

2002年8月

目 录

区域经济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曾菊新 梁 滨(1)
中国区域开发中的效率与公平	邵清於 曾菊新(7)
区域发展模式与中国区域发展模式的选择	黄 翔 谭传凤 宋玉蓉(19)
试论区域经济空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	谭传凤 李祥妹(24)
“非自然跳跃式开发战略”——生产布局中的反思	谭传凤(30)
试论湖北大“三角”战略及武汉市产业结构调整	谭传凤 蒋昌茂 夏焕春 陈 泽(35)
在市场经济体制与 WTO 背景下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新认识	刘嗣明(40)
大西北经济开发的关键——制度创新	张正平(46)
扩展式开发战略与秦巴山区的开发	谭传凤(51)

ON THE MODES OF URBAN-RURAL NETWORK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	Zeng Juxin(59)
-------	----------------

STUDY ON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流域开发

试析长江流域空间经济系统运行机制及其演变规律	邓宏兵(73)
长江流域空间经济系统形成的要素分析	邓宏兵(77)
长江流域空间经济系统的特征研究	邓宏兵(81)
我国国际河流的特征及合作开发利用研究	邓宏兵(86)
湖北省长江沿岸地带农村区域开发类型及其发展方向	徐东文 王俊红(91)

城市发展

UGIS 及其在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的应用	喻光明(96)
论新世纪适宜居住的城市观	曾菊新(106)
湖北省城市体系分形特征及其规模结构研究	李家成(112)
关于江汉平原城市群的若干问题	邓先瑞 徐东文 邓 巍(116)
武汉城市交通网络分析和布局研究	刘盛佳(121)
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	龚胜生(127)

资源利用

中国南方石灰岩荒山开发利用新探	徐樵利(137)
“三角形法”在区域国土资源综合评价中的应用——以湖北大别山区为例	谭传凤(143)
试论我国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黄建武 邓先瑞(152)
江汉平原渍害田生态特征的研究	喻光明(157)

对土地科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	张 毅(166)
生态环境	
论中国第四纪冰期与间冰期	景才瑞 刘会平(170)
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初步研究	邓宏兵(175)
清江流域的环境问题研究	卢武强(182)
矿区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以大冶铜绿山及其周围地区为例	陶家元(187)
持续发展	
持续发展与地理学之管见	刘盛佳(194)
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地关系协调	龚胜生(201)
武汉市实施清洁生产的方案构想	朱丽霞 任贤友(209)
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评价	曾 群(213)
遥感应用	
STUDY ON THE DAMAGE OF THE“91.7”RAINSTORM IN SIHU DRAINAGE AREA WITH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 TECHNIQUE Yu Guangming Chen Ping Wu Xuejin Wang Chaonan(219)	
基于 GIS/RS 的洪涝灾害承灾极限遥感估算方法	喻光明 张金霞 王朝南 何耀喜(225)
江汉平原渍害田热力学特性及其遥感研究	喻光明(234)
历史地理	
晋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京相璠	刘盛佳(240)
《禹贡》——世界上最早的区域人文地理学著作	刘盛佳(247)
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	刘盛佳(254)
2000 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	龚胜生(261)
2000 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	龚胜生(271)
中国宋代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	龚胜生(282)
湖北省重大自然灾害历史资料的建库与应用	毛政元(291)
旅游开发	
旅游地周边乡村社区的功能与结构更新	刘 明(297)
中国可持续旅游的资源环境政策思考	敖荣军 韦燕生(301)
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的若干思考	蔡靖方(306)
我国现代旅游产品开发的初步研究	李星明(310)
湖北省旅游教育发展探微	胡 静 李家清 谭传凤(315)
地理教育	
关于改革《中国经济地理》教材体系的新构想	曾菊新(320)
对编写高中地理新教材的认识与建议	李家清(323)
论世界国家的分类	卢武强 黄敏新(326)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曾菊新 梁 滨*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增长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函数。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分析经济实情，剖析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制定合适的国家及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等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拟就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几十年历程进行纵向及横向比较研究，以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规律及趋势。

1 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1.1 工业显著增长，区域工业增长规模的等级结构基本未变

各省市普遍增长较快，近 10 年来增长更快。1952~1979 年，全国有 23 个省市工业年平均增长大于 10%（未计价格变动因素），且速率相差较小，这说明呈均衡增长格局。省际增长也有一定差异，如宁夏、青海分别高达 17.21% 和 15.83%，而天津、辽宁和上海都只约超过 8%。这种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增长速度相对高于较发达地区的现象是多种因素所致，其中与这一时期国家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有较大关系。1979~1991 年区域工业增长呈现新的态势，主要反映在普遍高速增长的同时，省际差异明显拉大，如高增长的广东与低增长的西藏、上海分别相差 16.56 和 11.66 个百分点。

大多数地区工业产值的位序变化较小，少数地区位序出现相反变化。1952 年位居前 8 名的省市（沪、辽、苏、鲁、津、黑、冀、粤）中仍有 6 个保持位居 1991 年的前 8 名（苏、鲁、粤、沪、辽、浙、川、冀）。1952 年工业产值最少的 8 个省区（宁、青、琼、内蒙古、新、甘、贵、云）到 1991 年仍处在最末的位置。位序基本不变的格局说明全国区域工业水平的等级结构比较稳定。近 10 年来，位序变化较明显的是广东、浙江、山东、福建和江苏等地区都向前位移，而上海和辽宁、黑龙江等地区向后位移。这是一种老工业基地不景气与新兴工业区崛起的并存格局。

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工业增长也呈现出类似格局：都有显著增长，但东部始终是工业相对发达的区域，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落后（表 1）。从三大地带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的变化分析，东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呈缓慢下降之势，中、西部的比重相对上升。但 80 年代以来三大地带工业增长又出现了相反的态势，东部比重上升，中、西部比重略有下降。90 年代仍将保持这种增长格局。

1.2 农业稳步增长，区际差异趋向缩小

从低速均衡增长到高速增长。1952~1979 年，各省市农业都处于一种低速增长（3.61%~7.26%），绝大多数地区增长速率只相差 1~2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策和技术等增长因素的影响，农业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其中新疆、海南、广东、福建、北京、天津和山东等地增长率均大于 15%（未排除价格变动因素）。

省区之间和地带之间的总量增长变化较小，人均增长量变化较大。1952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位居前

* 梁滨单位为中国投资银行湖北省分行。

表 1 三大地带工业产值的增长及地域结构变化

年份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产值 (亿元)	占全国 (%)	产值 (亿元)	占全国 (%)	产值 (亿元)	占全国 (%)
1952	234.36	68.11	77.19	22.43	32.56	9.46
1957	459.67	65.24	162.03	23.00	82.89	11.76
1965	882.46	60.84	395.10	27.24	172.79	11.91
1970	1325.92	59.87	606.64	27.39	282.13	12.74
1979	2775.96	59.23	1295.53	27.64	614.95	13.12
1980	3099.19	60.82	1403.31	27.54	593.25	11.64
1985	5845.66	60.24	2637.57	27.18	1220.3	12.58
1991	18006.94	63.75	6925.78	24.52	3315.31	11.74

资料来源：国统计局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2）。工业总产值均用当年价。

8名的地区（鲁、苏、冀、川、豫、湘、皖、浙）到 1991 年仍有 6 个位居前 8 名（鲁、川、粤、苏、豫、湘、鄂、冀）。这表明占有全国较大农业份额的地区增长趋于稳定。地带之间的增长变化也比较小。1952～1991 年东部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只上升了 2.67 个百分点（表 2）。不仅如此，地带之间农业总量的差异小于工业差异。但是按人均生产水平分析，1952 年人均农业总产值居前 8 名的地区（内蒙古、新、黑、吉、宁、京、青、浙）到 1989 年只有 2 个保持在前 8 名（粤、新、苏、浙、闽、鲁、鄂、皖）。这种较大的变化，除人口这个变量因素的影响外，还与这些地区农业结构和农业增长速率的影响有关联。不论是总量分析还是人均占有量比较，现实的农业区域增长虽仍有一定差异，但东西或南北地区大体上呈现稳定、均衡增长。这种增长格局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和良好基础。

表 2 三大地带农业产值的增长及地域结构变化

年份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产值 (亿元)	占全国 (%)	产值 (亿元)	占全国 (%)	产值 (亿元)	占全国 (%)
1952	193.12	45.09	158.73	37.06	76.42	17.84
1957	234.58	40.82	210.63	36.65	129.47	22.53
1965	336.95	41.87	281.47	34.97	186.38	23.16
1970	421.54	41.94	380.52	37.86	202.97	20.20
1979	775.63	43.46	658.66	36.91	350.30	19.63
1980	848.53	43.97	695.48	36.04	385.58	19.98
1985	1644.18	45.45	1281.36	35.42	692.23	19.13
1991	3896.20	47.76	2663.80	32.66	1597.20	19.58

资料来源及说明同表 1。

1.3 人均国民收入地区类型变化明显，三大地带呈现加速增长之势

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指示。表 3 概略地反映了各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 80 年代三个年度的变动格局。1989 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人均国民收入皆大于 800 元，而在 1980 年只有沪、京、津三个直辖市。人均 1500 元以上的高收入地区从 1980 年的 1 个（上海）增加到 1985 年的 3 个（沪、京、津），1989 年又增加了辽宁、广东、浙江、江苏 4 个，共达 7 个。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人均收入在经历了“二五”及三年调整时期增长速度减缓后开始加速增长，1985～1989 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5.13%，中部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增长速度起起落落，之后开始加速增长；西部在“一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高速增长，60 年代中期以前，西部增长速度居三大地带之首，在经历了“三五”时期增长速度猛跌之后

不断加速,1985~1989 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同时期东部水平。综观 1952~1989 年,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东部,次为西部,中部最慢(表 4)。

表 3 人均国民收入地区类型

人均国民收入(元)	1980 年	1985 年	1989 年
1 500 以上	沪	沪、京、津	沪、京、津、辽、粤、浙、苏
1 000~1 500	京、津	辽	黑、鲁、吉、闽、新、鄂、琼、冀、青、晋
800~1 000	——	苏、浙、黑、粤	内蒙古、宁、皖、湘、陕、甘、豫、赣、川、藏、云、桂、黔
600~800	辽	吉、鄂、鲁、新、晋、藏、冀、闽、青	——
400~600	黑、苏、浙、粤	内蒙古、宁、湘、皖、赣、甘、陕、川、豫、云	——
300~400	吉、鄂、青、冀、新、鲁、晋、甘、湘、宁、赣	桂、黔	——
200~300	闽、陕、内蒙古、川、豫、皖、藏、云、桂	——	——
200 以下	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整理，各年度属同一类型的地区按人均国民收入从大到小依次排列。

表 4 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比较 (%)

时期 区域	1952~ 1957 年	1957~ 1965 年	1965~ 1970 年	1970~ 1975 年	1975~ 1980 年	1980~ 1985 年	1985~ 1989 年	1952~ 1989 年
东部	7.12	2.94	4.08	4.79	8.95	12.60	15.13	7.26
中部	6.96	3.12	3.16	2.44	7.91	12.14	14.05	6.58
西部	10.82	3.72	0.79	2.67	8.69	12.05	14.68	7.02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

2 区域经济增长对比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逊根据世界 24 个国家的截面和时间序列资料，对区域增长的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提出了随着经济的逐步增长，区域间的差异呈倒“U”型变化的理论。威廉逊指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经济的总体增长，区域间差异逐渐拉大，直至最大程度；当经济进入成熟增长阶段后，区域差异将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而逐渐减少（图 1）。

然而，倒“U”型理论却不能验证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轨迹。中国区域间增长差异的变动格局与倒“U”型存在较大偏差，反映了倒“U”型理论的局限性及非通用性。笔者认为，前述 30 多年来的资料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曲线呈“M”型及“W”型变动格局。

我们研究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采用的指标是人均国民收入加权变差系数（ $CV_{(w)}$ ），因为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加权变差系数（或称加权离差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是评价区域经济差异的首选指标或最佳指标。加权变差系数值越大，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则越大，反之亦然。加权变差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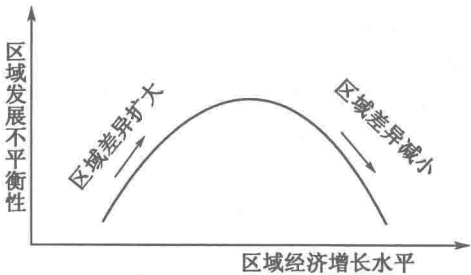


图 1 倒“U”型相关

$$CV_{(w)} = \frac{\sqrt{\sum [(y_i - \bar{y})^2 \frac{p_i}{p}]}}{\bar{y}} \quad (1)$$

其中, y_i 表示某省(市、区)或某地带人均国民收入; p_i 表示某省(市、区)或某地带人口数; p 表示全国总人口数; $\bar{y}$ 表示全国人均国民收入。

由公式(1)算得各年度省、市、区加权变差系数, 将这些数据描点绘图则得出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轨迹图(图2)。类似地, 可得出三大地带间经济增长差异轨迹图(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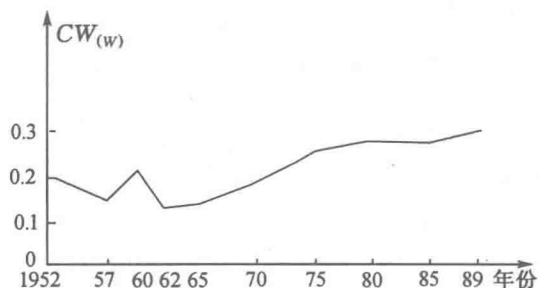


图2 省市区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变化 (“M”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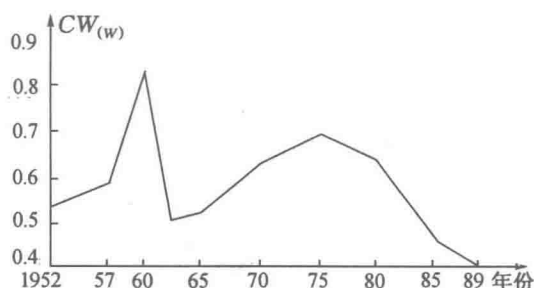


图3 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变化 (“W”型)

由图2可见, 中国省市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呈“M”型变动格局。即20世纪60年代以前, 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加大, 1960~1962年经济萧条时期地区间经济差异陡然减小, 此后直到70年代中期, 差异又逐渐拉大, 自“五五”时期至今, 经济差异趋于缩小。

三大地带间经济增长差异图则显得平缓, 呈“W”型变动格局(图3)。1957年以前, 差异缩小。在“二五”时期, 以1960年为界, 经济增长差异经历了拉大到缩小的阶段, 此后基本上一直呈缓慢拉大之势, 其中包含局部的略微缩小阶段。

关于此问题有学者认为三大地带差异呈“U”型变化格局, 笔者持不同意见。问题的关键在于1957~1962年一段变动是否可以忽略。笔者认为不能忽略, 因为: ①历时较长, 共涉及6个年份, 更重要的是1958~1962年为“二五”计划时期, 这一变动正好反映了“二五”时期三大地带经济差异的变化情况。②在“一五”、“二五”及1963~1965年调整时期里 $CV_{(w)}$ 的最大值及次最小值均出现在1957~1962年间, 对评价“四五”时期以前的经济差异状况有重要意义; ③在各个计划时期以及1963~1965年调整期里, $CV_{(w)}$ 值变化幅度最大的(也就是三大地带经济差异变化最大的)就是“二五”计划时期。因此, 我国三大地带经济增长差异呈现出“W”型变化格局。

比较图2及图3, 显而易见70年代中期以后, 两图所示曲线呈反向变动格局——省市区经济差异显著减小, 而三大地带间总的说来却呈差异加大之势。究其原因, 主要是“六五”以来, 中央采取了东倾政策, 导致三大地带差异扩大, 但由于资金投入和政策优惠的重点区域并不是收入水平高、宏观经济效果好的老工业基地(上海、辽宁等), 而是原处于中间收入水平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区, 故使得省际经济差异总体上缩小。

今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变化是否完全合乎倒“U”型演变规律, 还难以定论。从现实发展趋向分析, 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今后一定时期内, 区域经济增长(不论是地带、省区之间还是城乡之间)的差异不是缩小而是逐步拉大。从理论上分析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是这种差异先缓慢扩大, 然后快速减小; 二是差异在短期内快速扩大, 随后保持缓慢缩小态势。究竟呈现哪种格局, 这取决于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以及市场作用和国家宏观调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影响程度。

3 区域经济增长趋势

研究区域经济,探求落后区域如何赶上先进地区的速度,是经济发展战略中一个重大问题。根据分析,我国省区间相对差异自 1978 年以来一直趋于缩小,然而,省区间的绝对差异却在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区域之间在起始阶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称之为差异基数),而增长速度与基数的负相关程度很高。基数越小,速度提高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基数较小的落后区域的增长速度小于基数较大的先进区域,则绝对差异将会加速扩大,即便落后区域的增长速度超过先进区域,但如果二者速度差距不是很大,绝对差异依然是扩大的。那么,落后区域究竟应达到怎样的增长速度才能缩小与先进区域之间的绝对差距,我们可以推导出落后地区增长速度公式来予以说明。

设先进区域的基数为 A,增长速度为 a,落后区域的基数为 B,增长速度为 b,若要 n 年之后两区之间绝对差距缩小,则必须:

即

$$A \cdot (1+a)^n - B \cdot (1+b)^n > A - B \quad (A > B)$$
$$B \cdot (1+b)^n > A \cdot (1+a)^n - A + B$$
$$1+b > \sqrt[n]{\frac{A [(1+a)^n - 1] + B}{B}}$$

则

$$b > \sqrt[n]{\frac{A}{B} [(1+a)^n - 1] + 1} - 1 \tag{2}$$

表 5 人均国民收入最高区与最低区比较 单位: 元

年份	最高区 (上海市)	最低区 (贵州省)	绝对差异
1978	2 247	156	2 091
1979	2 354	174	2 180
1980	2 479	190	2 289
1981	2 520	203	2 317
1982	2 518	235	2 283
1983	2 556	260	2 296
1984	2 845	324	2 521
1985	3 384	365	3 019
1986	3 450	403	3 047
1987	3 816	465	3 351
1988	4 485	570	3 915
1989	4 597	622	3 975

资料来源: 同表 1

据表 5 计算得出上海市人均国民收入近 12 年来年平均增长率为 6.72%, 假设今后 10 年里上海市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以 1989 年上海市与贵州省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数, 若要 10 年以后贵州与上海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差距有所缩小, 则由公式 (2) 算得贵州省今后 10 年内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应达到 22.76% (高于贵州省 1978~1989 年平均增长速度 13.4 个百分点), 这样高的年均增长速度是不大可能的。因此, 中国区域经济未来的增长趋势, 落后省区和先进省区比, 前者的增长速度可能快于先进省区, 导致省区间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 但绝对差距仍可能扩大。

以类似方法可以考察三大地带的增长趋势。从前述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速度比较中我们得知, 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 东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较中、西部高, 故导致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差异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进一步拉大。如果东部速度不变, 要求西部 50 年后达到绝对差距比 1989 年有所缩小为目标, 则西部必须在今后 50 年里保持 16.61% 的年平均增长率, 这对西部而言确实有很大困难。因此, 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绝对差距趋于扩大是很难避免的, 只能以争取彼此相对差距缩小为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发达区域表现为在既得优势下的继续高速增长，而落后区域的资金和劳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放开，产生向发达区域聚集的“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这将不利于落后区域的经济增长。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言：“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是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小区域间的差异。”因此，即使要求缩小先进与落后地区的相对差距，也相当艰巨。

本文原发表于《经济地理》第14卷（1994年）第1期。

中国区域开发中的效率与公平

邵清於 曾菊新

1 引言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以来,效率与公平成为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Kuznets, 1955, 1963)。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被称为效率目标)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或均衡(一般被称为公平目标)也成为区域开发与规划中的两大目标(Friedmann and Alonso, 1975)。

虽然效率与公平的概念在有关区域开发文献中经常出现,但迄今却无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效率指的是经济效率,即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核心,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从宏观国民经济角度来看,就是以有效的资源配置,多快好省地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提供社会需要的服务)。而公平则是人们的利益和权利分配合理化的概念,因此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涵义,而且涉及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等领域。(公平的概念不仅涵义广泛,而且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的差异等等,有关公平的原则和观念也会随之变化。即使在同等条件下,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公平标准。要对现有的各种公平观作出抽象概括很不容易,想给公平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也很困难。再说,也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允许。)但由于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是人们最根本的利害关系。公平这一概念的经济内容也成为它所包含的其他方面内容的基础。在区域开发研究中,公平概念主要是指区域之间产品和收入分配的均衡程度。本文正是从上述意义出发,使用效率与公平概念的。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50 年代后期,缪达尔(Myrdal, 1957)和赫希曼(Hirschman, 1958)提出了空间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极化的模型,在西方流传甚广。他们认为,在发展初期阶段,发达区域或中心往往占有优势,如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外在经济、政治权力、决策者的偏好、来自发达区域的精力充沛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和专业人员、由广大腹地流入发达区域或城市金融市场的资金以及其他种种因素。这些因素将导致空间经济的极化,即经济向发达区域或中心集中,使区域收入的差别增大。但是,当达到某一点后,扩散效应(或称下渗效应)就逐渐显著起来。发达区域和后进区域的条件会发生变化,空间经济一体化可以逐步实现。因而按照这种观点,在发展初期阶段,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之间的差别会增大,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则将趋于均衡。

上述观点得到了威廉逊一项实证研究《区域不均衡和国家发展过程》(Williamson, 1965)的支持。他在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差别大,而发达国家的区域差别则较少;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差别趋于扩大,而发达国家的区域差别则在缩小;区域差别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呈倒“U”形(或钟形)曲线,其高峰出现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但随着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区域差别就趋于缩小(Alonso, 1980; 邵, 1984)。那就是说,区域差别,在经济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并不很大;但当经济起飞时,区域差别就会扩大;然后,又逐渐缩小。所以按照赫希曼等人的观点,区际不均衡,即极化现象,似乎是初期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随着经济发展,它将自然而然地通过某种负反馈得以校正。区际不均衡并不是什么病症,而只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痛楚(Alonso, 1968)。

但威廉逊在前述论文中,还是引用库兹涅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Kuznets, 1955)一文中的问题,指出:“如果当代的欠发达国家试图在一个较为薄弱、较不稳固的社会政治支架上达到工业

化,那么这些欠发达社会能承受得住可能产生的收入不均等进一步扩大的重负吗?”

在这20多年间,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讨论在国际上盛极一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曾经是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的热烈议题。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经常被作为例证在有关文献中出现。“要是看一下中国,似乎将经济发展和某种社会公正结合起来,还是有可能的。”(Friedmann and Weaver, 1979)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确实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肯定答复的国家,是这方面的典范。

然而,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内学术界纷纷对长时期内被看做是社会主义原则的生产平衡布局提出了质疑。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的基础上,出现了诸如“梯度推移”论等多种思想。80年代中期又明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于是,区域开发不均衡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关注的一大焦点。

那么,中国在其经济建设中究竟是如何看待与处理区域开发中的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是否的确不可兼容?在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区域差别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今后趋向将会怎样?相应地应采取什么对策?关于这些问题,作者拟对之作某些探讨。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分如下三个部分:一、观念变化;二、实证研究;三、趋向与对策。

2 观念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整个80年代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人们对效率与公平的看法也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前所未有的劳动生产率,使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尽快地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化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点上,似乎很难说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注意效率。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却过分重视产量,忽视了质量,过分强调速度,低估了效益。“欲速则不达”,结果反而造成效率低下。其实,增加产量,加快速度,是效率的一部分。只有多、快、好、省,即增加产量和加快速度,又提高质量和讲求效益,才是完整意义的效率,或者说,才是真正的效率。尽管现在看来,要牢固地树立质量和效益观念并不容易,还要有一段过程和时间;而要切实地提高效率,更是需要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对效率在认识上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建设在80年代重大的观念变化。

众所周知,在社会发展史上,由奴隶制变为封建主义,又由封建主义转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朝着公平方向迈进的过程。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当然也为实现更大的公平创造了前提。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生活中错误地把公平等同于均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没有真正贯彻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实行的是“大锅饭”和“铁饭碗”,造成绝对平均主义盛行,“一平二调”严重。因而也就严重地损害了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了陈旧的公平观念,人们逐步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带动愈来愈多的人富裕起来,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目的的必由之路。

由于对效率和公平在认识上的突破,自然地引起了中国区域开发思想的变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经济落后,区际差别很大的多民族国家。从长期来看,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致力于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事业,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一项毋庸置疑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看法和做法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西方区域开发研究的文献中,往往以“北方”代表发达区域,以“南方”代表欠发达区域,把区域发展中的二元性概括为“南北关系”或“南北问题”(如Hirschman, 1958; Williamson, 1956)。而在中国,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表现为沿海和内地,或东部和西部,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东西关

系”或“东西问题”。中国的“东西问题”关系到投资地区分配的优先顺序问题，实质上也是区域开发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在中国的“东西问题”上，传统观念认为，要尽快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生产布局不平衡，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别和巩固国防，就必须大力发展内地经济，推动生产布局西移。这种观念主要是从考虑政治和国防安全出发，强调公平目标，而忽视了效率目标。没有看到各地区的原有基础和自然、经济条件不同，在同等投资情况下，所取得的效果及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也就不同。同时在实施中，也必然要采取“抽肥补瘦”、“拔苗助长”的措施。结果是事与愿违，发达区域的发展受到抑制，而欠发达区域的面貌难以迅速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损害，（张，1989；王，1990）。当然也应看到，这种观念的形成同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出现了有关“东西问题”的新观点。这种观念的持有者提出：缩小并消除区域之间的差别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是一场“持久战”；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应优先投入对国家发展关系最大、见效最快、效益最高的地区（往往也就是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应积极准备各项建设条件，并尽力防止区际差别的过于扩大；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欠发达区域建设条件的逐渐具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欠发达区域（Shao, 1985）。按照这种做法，尽管从短期来看，区域之间的差别可能有所扩大，但就长期而言，却既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较快的发展，符合效率目标，又能切实有效地逐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别，达到公平目标。这种假设的形成既汲取了区域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有关理论，又不同于西方的极化模型。它建立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基础上，既注意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又重视国家计划宏观调控的加强。

80年代中国“东西问题”的又一新的发展，就是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1986）。这是因为经过30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内地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使广大内地可以进一步分为中部和西部两个经济地带，从而形成全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格局（邵，1987）。

与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相关的是所谓“梯度推移”论的出现（陈，1984）。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发达的东部，次发达的中部和欠发达的西部，即呈现出按东、中、西为顺序的梯度分布，因而在生产布局和地区开发上，也应遵循东、中、西的顺序，实行由东向西的梯度开发，逐步推移。由此也就引发出诸如“反梯度”论、“跳跃式开发”论等等一系列的争论（蒋，1988；胡，1991）。这是近10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的最为热烈的论争。当然，在讨论中，某种程度的地方感情时有流露，这是不难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还应尽可能地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探讨，才能使这场讨论取得更大的成果。

从三大经济地带出发的“梯度推移”论确实存在严重的缺陷。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别的概括反映，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但它又是一种十分粗略的反映，因此将它作为具体的投资分配的主要根据，并不恰当。首先，三大经济地带各自界线的确定，同其他各种区域界线的确定一样，总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事实上，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可以有几种方案。就现有的划分而论¹，例如为什么内蒙古是在中部，四川划归西部，而广西又分在东部？这些都很难以说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差别作出的划分。其次，与之相联系的是各经济地带内实际上都有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同时并存。如果不作进一步具体分析，忽视中、西部的发达区域和中心，笼统地把东部所有地区都看做发达区域，实行所谓倾斜政策，显然是简单化的看法和做法。这既不能真正发挥地区效益，也不符合公平原则。至于“梯度推移”论本身所提出的由东向西，逐步推移的说法，过于强调了效率目标，忽视了公平目标。而公平目标对中国这样一个区际差别悬殊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实在至关重要，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同时“梯度推移”论的提出缺乏对其内在机制的论证，因而理论根据不足。

围绕着三大经济地带和“梯度推移”论的讨论，近年来，在中国有关区域开发研究的文献中，出

现了愈来愈多的对区际差别扩大的批评。“我国 30 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布局已在全国逐步展开，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但近年来的区域发展态势，不仅把过去缩小了的差距抵消殆尽，而且还在新的水平上扩大了沿海和內地的经济鸿沟，甚至回到了解放初期的状态。”（唐，1988）“许多学者的流行看法是，1978 年以来我国的区域收入差异在加速扩大。”（魏，1990）

以上是中国“东西问题”上观念变化的一个简略概述。那么，究竟中国的区域差别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有什么含义？作者将在下部分加以探讨。

3 实证研究

对区域开发中效率与公平的实证研究，重要的是指标的选定和数据的收集。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基本建设投资 and 国民收入统计资料，选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和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基本指标，进行了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各地区基本建设投资额（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1987，1989，1991），减去不分地区部分的投资额，求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建投资比重，制成图表（见图 1 和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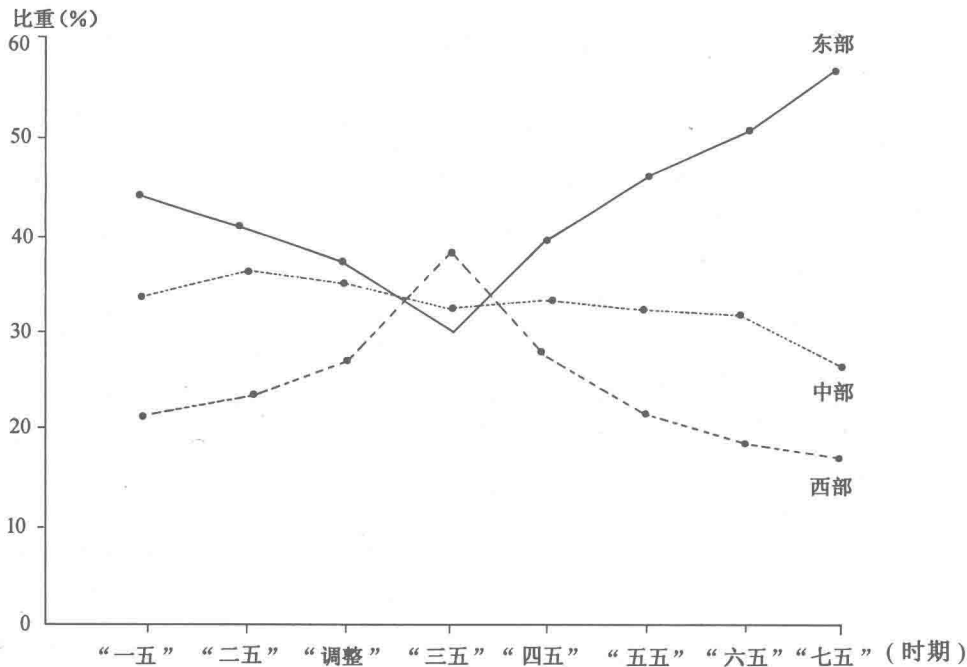


图 1 各个计划时期三大经济地带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的变化
表 1 各个计划时期沿海与内地基建投资比重 (%)

地区 时期	沿海	内地			沿海与内地即东部 与中、西部投资比
	东部	中部	西部	小计	
“一五” (1953~1957)	44.08	34.38	21.52	55.90	1:1.27
“二五” (1958~1962)	40.65	36.00	23.37	59.37	1:1.46
“调整” (1963~1965)	37.49	35.04	27.45	62.49	1:1.67
“三五” (1966~1970)	29.39	32.51	38.08	70.59	1:2.40
“四五” (1971~1975)	39.47	33.28	27.28	60.56	1:1.53
“五五” (1976~1980)	45.77	32.70	21.55	54.25	1:1.19
“六五” (1981~1985)	50.66	31.06	18.29	49.35	1:0.97
“七五” (1986~1990)	56.44	26.31	17.24	43.55	1:0.77

资料来源：按《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1986~1987）、（1988~1989）及其他数据计算。

从图 1 可以看出各个计划时期三大经济地带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变化情况：东部经济地带经历了由高到低，又由低到高的过程；西部经济地带则相反，是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过程；中部经济地带起伏较小，“二五”以后，平缓下降。表 1 又进一步说明各个计划时期三大经济地带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的具体变化。“一五”期间，东部沿海的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额的 44.08%，其中一半是在辽宁和北京（合计 22.18%），而辽宁更是占全国基建投资额的 13.92%。这同辽宁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北京作为全国首都，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在随后的大约 20 年内，东部沿海的基建投资比重迅速下降，“三五”期间更是仅占 29.39%，降到最低点。而中、西部内地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基建投资比重不断上升，“三五”期间达 70.59%，为最高点。该时期的区域开发和生产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出之于对政治和国防安全的考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为改变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而作的努力。如前所述，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区域开发从强调内地和“三线”建设转变为向沿海倾斜。沿海的基建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内地的比重持续下降。进入 80 年代后，东部沿海的基建投资比重超过了中、西部合计的内地的比重。更新改造投资的地区分布大体上也是如此。表 2 中，各个计划时期基建投资额居前六位的省、市、区名单的变化，同样反映出这种变动情况。应当指出的是 80 年代某些内地省区仍然在全国基建投资中占有相当比重，如黑龙江在“六五”和“七五”期间分别占 5.52% 和 4.76%；四川分别占 4.92% 和 5.4%；湖北为 4.51% 和 3.54%；山西为 4.43% 和 3.82%；河南为 4.11% 和 3.52%。因此从上述基建投资的地区分配来看，优先发展沿海发达区域以提高效率的战略部署固然十分明确，而对公平原则也似乎很难说没有予以考虑。

表 2 各个计划时期基建投资额居前六位省、市、区所占比重

时期	前六位省、市、区名	占总投资额比重(%)
“一五”(1953~1957)	辽、京、黑、川、陕、吉	44.84
“二五”(1958~1962)	辽、川、黑、豫、京、鄂	34.54
调整(1963~1965)	川、黑、辽、粤、京、甘	36.03
“三五”(1966~1970)	川、鄂、黑、甘、滇、黔	40.45
“四五”(1971~1975)	川、辽、鄂、陕、冀、黑	37.49
“五五”(1976~1980)	鄂、辽、冀、川、鲁、粤	36.41
“六五”(1981~1985)	粤、沪、辽、黑、京、冀	37.00
“七五”(1986~1990)	粤、沪、辽、鲁、京、苏	40.95

资料来源：同表 1。

但是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中，相当普遍地认为：在 80 年代，由于实行效率优先的区域开发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急剧扩大。对此，我们利用历年各省、市、区的国民收入统计（国家统计局，1990），进行了一些分析。

图 2 以历年全国人均收入为 100，反映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东部的人均国民收入历来高于全国平均值，中部和西部则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值。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除中部人均国民收入与全国平均值略呈偏离外，东部和西部都是趋于会聚。但是比后，三大地带的差距逐步扩大；特别是以追求“均衡布局”为目标的“三五”和“四五”却是三大地带离均差迅速加大的时期。80 年代三大地带的差距又继续有所扩大。由于图 2 所提供的只是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变化的概略趋势，我们参照威廉逊的研究（Williamson, 1965），计算了加权变差（或差异）系数。表 3 中三大经济地带的加权变差系数的变动基本上与图 2 所示相一致。

但是必须看到，变差系数是直接受地域划分程度影响的，地域单位愈大，被掩盖的差别就愈大。三大经济地带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组合。按照现行行政区划，全国除台湾、香港和澳门外，有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显然，要了解中国的区际差别，不能停留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上，而应运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表 3 的后半部分就是我们的计算结果。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不同